

共同富裕视域下“投资于人”的理论内涵与路径选择^{*}

侯为民^{1,2}, 司培颖²

(1.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北京 100732;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2218)

摘要:对人的投资是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人口生产和再生产的必要手段,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于人”与实现共同富裕具有内在统一性。“投资于人”能够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社会财富更快增长;能够推动消费扩容,拉动投资以满足高层次需要;能够有利于劳动力再生产,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创造条件。贯彻投资于人的思维和理念,应立足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制定完善“投资于人”的经济发展指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完善民生制度体系。在投入路径上,要优化投资结构,加强科技投入、教育和培训投入、民生投入和社会公共消费投入。在改革措施上,要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公共投资结构,确保人力投资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促进消费结构升级,释放我国超大经济体的消费潜力。

关键词:共同富裕;投资于人;人口质量;公共消费

中图分类号:D61;F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26)04-0001-11

促进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统筹投资和消费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必然要求。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促进精神共同富裕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将投资于人作为重要的发展基点。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要“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1]。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一步强调,“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2]。“投资于人”不仅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根本体现,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最终实现。

^{*} 收稿日期:2026-05-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2STA035)“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

作者简介:侯为民(1967—),男,江苏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

司培颖(1996—),女,河南商丘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本文引用格式:侯为民,司培颖.共同富裕视域下“投资于人”的理论内涵与路径选择[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43(4):1-11.

一、“投资于人”的三重考察维度

“投资于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本质要义之一,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马克思立足于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在物与人的对立关系中,分析了人力投入形式所赖以形成的社会条件,并科学地设想了未来社会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趋势。马克思对社会生产发展内在规律的揭示和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科学论述,对当前我国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

(一) 生产力理论中的“投资于人”

在经济生活中,对人的投入一直是物质生产活动的历史性前提,这是由人类劳动的性质及其重要作用决定的。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说要建立在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基础之上,而劳动在物质资料生产中具有决定性意义。人类社会“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3]531}。在物质资料生产中,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是构成生产力的3个最简单的要素。其中,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物质资料生产变革的主体性力量是人,生产实践是人的最重要、最基础的实践。在生产实践中,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解放是内在统一的,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最终指向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与资产阶级学者关注物质投资的视角不同,马克思所建构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将对人的投资置于资本主义的场景下,以可变资本的视角揭示了其历史局限性。劳动力之所以采取可变资本这一历史形式,一方面是因为其在商品价值的创造中所具有的独特属性,另一方面则是源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社会性质和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占有规律。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对人的投资是从属于对物的投资。不过,对任何社会来说,“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4]200}。就社会财富的生产而言,对劳动力的投资具有共性的一面。无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合格的劳动者的形成都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如具备一定的体力、智力、技能和经验等。技能积累和经验提升是劳动者在社会中通过生产实践、劳动参与、技能培训和教育等途径实现的。总之,对劳动者的持续投入,既是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的重要条件,也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内生动力。人类社会要从物对人的统治下逐步解放出来,首要的便是加大对人的投资。

对劳动者的投入是促进社会财富增长的重要推动力。相比于不经过培训和教育的简单劳动者,科技劳动者、运用机器体系的劳动者和管理人员所从事的劳动都是复杂劳动,后者具有倍加的简单劳动的性质,在财富创造中的贡献也更大。“比社会的平均劳动较高级、较复杂的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力的表现,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既然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它也就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对象化为较多的价值。”^{[5]230}从生产力发展要求看,不管是投资于劳动者的体力、健康改善,还是投资于其知识技能提升,“投资于人”都可以改善生产力要素结构,推动生产力发展。一方面,从现有生产系统的维持看,“教育将使年轻人能够很快熟悉整个生产系统”^{[3]689};另一方面,当代社会中以科技人员为核心的劳动者,已经成为决定科技革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说法,专业化人力资本的投入是知识生产的重要条件,且其具有正外部性和边际报酬递增效应^[6]。

(二) 人口生产和再生产理论下的“投资于人”

投资于人是人自身的生产的基础。在历史发展中,人们在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同时要维持自身的生产。“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7]从人类社会的动态演进看,人自身的生产不仅依赖于物质资料的积累,还依赖于人自身的能力的发展。

人自身的生产,特别是人的能力的发展,需要大量的投入。首先,人自身的生产要确保现有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能力,为此需要与之相关的基础性投入,如医疗保险、健康保险、失业救济等社会保障投入。其次,人自身的生产通过生育、抚育和教育来维持和延续。现代社会投入生育、教育和医疗等领域的资源是巨大的,相关的福利制度也为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创造了条件。最后,人自身的生产,在一定意义上也构成物质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条件。由教育、保健、人口的迁移等投资所形成的人的能力的增长和平均寿命的延长,都是资本的一种形式^[8]。对人的投资,不仅是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推动力,还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源泉。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人自身的生产不会是原有水平上的重复和维持。就体力和智力而言,人口生产中智育、体育在其中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人口生产的未来方向是在各个方面造就与新型社会相适应的社会主体。“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5]556-557}只有克服人的片面性、使人充分占有人的本质以及促进人的个性、才能和潜力得到全面发展时,才能逐步实现人类解放。

社会发展是人类本身的解放过程。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投资,关系到人的综合素质提升,更决定着人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9]。而共产主义运动的使命,则是“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3]689}。只有回归于人,将“人”作为社会发展的衡量尺度与最终目的,才能打破物对人的束缚,释放人的自由时间,以“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10]。因此,人作为发展本身的目的,需要从人的身心健康、生活条件、科学素质、文化素养、劳动技能、创造能力和交往方式等各个方面得到全面的体现。这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注重加大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力度,发挥“投资于人”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

(三) 社会需要理论中的“投资于人”

对人的投资与人的需要理论紧密相关,“投资于人”本质上要立足于劳动者社会需要的实现。劳动者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劳动者的需要是历史的产物,而人的需要在历史进程中是动态地发展的。首先,“投资于人”是满足和产生新的社会需要的过程。“由于人类本性的发展规律,一旦满足了某一范围的需要,又会游离出、创造出新的需要。”^[11]因而,“投资于人”是适应社会需要,推动社会分工不断深化和劳动能力专业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为培养多方面发展的劳动者的过程。

其次,“投资于人”是消费的拓展升级过程。消费是社会生产的直接目的,消费的主体是劳动者,消费对象的生产者也是劳动者。劳动者的需要的产生和变化,决定了对人投资的基本方向。马克思指出:“消费直接也是生产,正如自然界中的元素和化学物质的消费是植物的生产一样。例如,在吃喝这一种消费形式中,人生产自己的身体,这是明显的事。而对于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从某一方面来生产人的其它任何消费方式也都可以这样说。”^{[4]14}“投资于人”可以拓展出新的消费市场和消费空间,“投资于人”是尊重劳动者主体性、实现提高社会需要水平的内在要求。

最后,“投资于人”与人的发展、社会生产目的是统一的。需要的实现程度在一定意义上是衡量生产发展程度的标准,而社会生产和实现需要的程度归根到底体现在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上,而这种发展程度又是由需要的实现程度决定的。马克思指出:“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12]。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确立“投资于人”的理念和原则,要遵循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需要看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实行商品经济,人民生活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会表现为对物质商品的需求量。坚持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才能使劳动者从生产资料的统治对象的处境下解放出来,保障劳动者的全面发展。在高质量发展中突出强调“投资于人”,不是脱离物质生产投入来实现对人的投入,而是依托于对物的投资,通过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不断创造出满足社会需要的社会财富即使用价值,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二、“投资于人”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与主要内涵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终极指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经济发展以社会发展为目的,社会发展以人的发展为归宿”^[13]。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实现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必须立足投资于人,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一)“投资于人”蕴藏着物质共同富裕建设的质变内容

投资于人是经济发展质量变革的必然结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上升不是线性的,量累积到一定阶段,必须转向质的提升,我国经济发展也要遵循这一规律。”^{[14]280}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同样如此,不能囿于线性思维上的单纯解释,将其与温饱问题的解决、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和单一维度的生活条件改善相等同,而要从生产力结构质变、人的能力提升、生活质量提升等多个方面综合理解。

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看,进入后工业社会,“投资于人”在物质财富生产中的重要性得到极大的提升。工业化进程的特点是生产资料积累能够带来更高的生产效率,第一部类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成为一个普遍性规律,在物质财富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也是我国长期维持高投资、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重要原因。工业化完成以后,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经济内容,在产值、就业、收入等各方面占据主导性地位。在传统产业中,由于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重构,围绕资源禀赋、产品成本和价格的传统竞争,逐渐让位于技术能力和人才质量的竞争。人才成为市场竞争的关键要素,对人才资源的投资力度决定着国家间竞争的成败。智能经济背景下这一趋势愈发凸现。在数据处理、信息交流、沟通技能等新型劳动与市场行为中,劳动者必须具备更密集的知识技能积累和更强的创新潜能。只有通过持续和大规模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才能更快地提高劳动效率和物质生产力。

共同富裕的实现必然要依托于生产领域的变革。“随着我国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变化,供给体系进行一些调整是必然的”^{[14]87}。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表面看是产业发展问题,实质是社会总劳动在部门间的重新分配和调整问题。这种分配和调整是建立在新型劳动形式、新业态的形成基础上的。数字产业的发展,使社会对数字技术研发人员、数字劳动者的需求急剧上升,劳动者教育培训等消费支出转换为新型投资,极大地拓展了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的专项投资渠道。旅游、康养、文化、休闲产业的形成,使财富的存在形态和消费方式发生了变革。在“总体劳动”视野下,不同劳动者的联系会进一步加强,商品生产

和服务贸易领域也会不断拓展并充实物质共同富裕的内容。由此可见,对人的投资也因此会大大促进物质共同富裕的实现。

(二)“投资于人”构成精神共同富裕的重要条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于人”是创造有效需求的主要途径。“投资于人”要求社会资源更多转向与人的发展直接相关的领域,而这依赖于更加充分的就业、更高质量的就业和更可持续的收入增长。“投资于人”不仅是个人的事业,还是整个社会投资转型行为,需要在社会总产出中拿出更多份额,为劳动者扩大消费提供坚实的支付能力保障。后者可以减少社会“预防性储蓄”带来的压力,促进居民将更多当期收入转化为即期消费,创造出更多的有效需求。

人的发展需求是多方面的,“投资于人”的领域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从劳动者个人来说,高层次的教育培训、高品质的生活体验等发展型消费资料的支出,既是劳动者个人价值提升所必需,也是人的全面发展所必备。劳动者通过可持续的健康投资,才能塑造出更稳定的心理品质,使人力投资在内涵式扩大的基础上进行。另一方面,从社会层面看,政府在就业、教育、医疗保健、养老、住房、社区生活条件、生态环境等领域的公共投资,可以促进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使劳动者在精神层面感受到更公平、更安全和更有获得感,促进精神共同富裕的实现。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实现全体人民精神共同富裕的优势所在。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人的发展和价值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奠定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初步基础。在这一基础之上贯彻“投资于人”的原则和理念,能够在结构层次和规模数量上进一步扩大劳动者的文化消费支出,使精神文明建设实现新的范式转变,为精神上的共同富裕创造更好的条件。

(三)“投资于人”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必然选择

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必须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需要完善投融资机制,构建新的生产力基础并发挥超大经济体的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历了三十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房地产投资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14]87} 创新投融资方式,既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围绕数字化智能化生产体系构建完善的劳动力竞争市场,又要适应市场消费结构的变化,从消费者主权出发加强和改进个性化生产、定制化生产。劳动者只有广泛参与技能培训、职场学习、健康管理、深度体验和个性化探索,才能持续提升个人素质。只有从人的发展出发,才能真正将现代科技、现代生产方式与现代消费方式结合起来。

“投资于人”是促进消费升级、满足更高层次消费需要的重要途径。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有着具体的内涵,在实践中富裕程度的提升需要通过消费的升级来体现。消费的升级,既包括基本生活资料的消费,又包括发展和享受资料的消费;既包括个人消费,也包括社会公共消费。不仅如此,对人的投资所带来的消费升级,还是促进经济发展转换动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必要手段。“大国经济的优势就是内部可循环。我国有十四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一万美元,是全球最大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居民消费优化升级,同现代科技和生产方式相结合,蕴含着巨大增长空间。”^{[14]354-355}“投资于人”能够创造出更大的市场。充分保障劳动者权益,规范其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就能够为劳动者开展旅游、文化、娱乐活动和参加教育培训创造条件,从而改善消费层次和结构,扩大服务消费的规模。

当前,我国消费升级的趋势日益加快,居民消费实现了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在数字经济加持

下,实物型消费主导开始让位于服务型消费主导。但受投资结构的制约,我国的供给结构转型却相对迟缓。从消费支出看,民生类财政支出在规模上增长较快,但在绝对水平上与其国际水平相比仍有差距。特别是社会公共支出和消费所体现的人力资源领域投入强度不高,与实物资本投入存在失衡,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和创新能力,不利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

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投资于人”的历史进步与面临的挑战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是人的价值提升和实现的过程。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总量的增长,我国对人的投资取得了显著成就。尽管我国在“投资于人”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难点和现实的挑战,但总的来看,当前我国注重“投资于人”具备了更有利的条件。

(一)我国在“投资于人”方面取得的历史成就

我国在“投资于人”方面取得的成绩,首先体现在人才资源总量和重点人才数量两个指标上。据统计,2025年我国的人才资源总量达到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7200万人,科学家与工程师的总体规模接近2000万人;此外,我国还每年培养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专业毕业生超过500万人^[15]。

从人才赖以形成的教育基础看,我国取得的进步是历史性的。在教育领域的资金投入层面,我国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连续10年超过4%^[16]。《202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9%,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0.8%,全国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4846万人^[17]。“十四五”以来,全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1.21年,比2020年提高0.46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15.37%,比2020年提高4.81个百分点^[18]。

教育投入的增长,极大地提升了我国人口的整体文化程度,为劳动者的整体素质提高奠定了基础。仅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就表明,2020年我国拥有大学(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就已达到218360767人^[19]。不仅如此,受教育程度成为提升我国劳动者数字素养与技能的关键因素。《数字经济人才蓝皮书:中国数字经济人才发展报告(2025)》显示,截至2024年底我国数字经济人才总量达3286万人^[20]。此外,我国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体系也不断完善。近年来,国家部署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提出从2025年到2027年底广泛开展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其中聚焦高精尖产业和急需行业、就业重点群体等开展补贴性培训3000万人次以上^[21]。

从就业、养老、医疗卫生和住房等民生类支出看,近年来我国财政支出增长迅速。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大了民生建设的力度,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仅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三项支出占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就从2012年的33%提高到了2024年的37.8%,相应地,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三项支出的总量从2012年的4.15万亿元增长到2024年的10.76万亿元^[22]。“十四五”时期,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支出20.5万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9.6万亿元,卫生健康支出10.6万亿元,住房保障支出4万亿元,加上其他领域支出,财政民生投入近100万亿元^[23]。这些领域的支出增长,充分体现了我国“投资于人”的实践进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创造了良好条件。

总之,从生产力发展和人口生产的角度看,我国对人的投资成绩显著,形成了大量适应现代化产业发展的就业人口,发挥了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成为中国经济创造长期持续增长奇迹的重要原因。从满足社会需要的角度看,随着经济快速增长,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我国在“投资于人”方面的成绩也是显著的。人民的物质消费领域不断拓展,消费内容日益丰富,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升。与此同时,我国在精神文化消费上也呈现出持续增长态势,国内市场活力进一步增加。

(二) 我国推进“投资于人”面临的现实挑战

通过“投资于人”促进共同富裕,在实践中需要应对一系列挑战。一是高技能人才供给总量不足。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口规模决定了“投资于人”的难度。我国高技能人才虽然数量增长较大,但相比于超过8亿的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来说仍然不足。高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口总量的比例仅为7%^[24]。具有较高技能的劳动力供给量仍偏少,难以满足现实的需求。《数字经济人才蓝皮书:中国数字经济人才发展报告(2025)》显示,截至2024年底我国数字经济人才缺口仍高达3200万人以上,高端复合型人才短缺问题尤为严峻^[20]。

二是教育投入虽然增长很快,但也存在投入不高、不均衡等问题。重点大学与普通大学、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经费差距较大,特别是城乡教育投入、大学教育与职业教育投入不均衡。2023年全国城市义务教育生均教育经费支出是农村的1.2倍左右,城市学前教育生均教育经费支出是农村的1.5倍左右。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许多OECD国家已建立完善的终身教育体系,而我国在该领域的投入相对滞后^[25]。

三是在社会公共消费中,满足人口更高层次发展需求的投资占比仍然相对较低。2023年,中国国家预算资金中,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占比为0.9%、1.5%、1.3%,分别较2003年下降10.2、0.9、0.8个百分点^[26]。

四是人力投资与实物资本投资之间的差距长期存在。由于经济增长方式和投资惯性的作用,2023年中国较其他经济体的投资率高10%~25%,较世界平均水平高14.56%,大量资金仍然持续流向物质资本扩张^[27]。新增投资拉动就业的效应持续减弱,且资本投入与人力资源投入在增量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失衡。与此同时,由于物质生产领域投资过多,过度的市场竞争导致劳动者工作时间和学习、休闲时间的失衡。劳动者普遍工作强度较大、工作时间较长,而休闲、生活和学习的时间则受到挤压,劳动者的时间权益被削弱,对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带来了负面效应。此外,人口再生产领域的问题突出,个体和社会整体在“投资于人”上的行为呈现出背离趋势。尽管社会层面在就业、养老、住房、教育等方面加大了投资于人的力度,但从个体层面看,由于生育抚养、幼儿照看和教育成本以及就业竞争等因素,个体层面对人自身的生产的意愿降低,成为制约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发展的新难题。

四、以“投资于人”促进共同富裕的现实路径抉择

在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要求下,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要顺应生产力发展规律和劳动力再生产规律,改善劳动力再生产条件,建立和完善劳动力价值提升机制,在收入增长下增强劳动者即期消费能力。要在转换观念的前提下,采取更有针对性、更加系统全面的有效政策和措施,促进“投资于人”取得更大成效。

(一) 制定完善“投资于人”的经济发展指标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投资于物”仍然是建设国内市场、发展经济的基础。但需要科学地调整投资于物的方向和领域。在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下,物质生产力发展毕竟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8]物质领域经济发展指标的制定,只有更符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诉求,才能更加科学合理,更有可行性和可持续性。同时,也不能将“投资于人”看作是独立于社会生产领域之外的经济问题,而应从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规律出发,明确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和作用。

促进投资于人,需要有相应的衡量指标。“投资于人”首先要注重人口生产、教育、科技和人才使用之间的良性循环,在指标上以“人”的成长与发展为中心构建相关考察指标,如对生育、养育、抚育和教育

等指标综合评价。要确立以教育和培训为中心的“投资于人”理念,将货币投入与实物性投入结合起来进行人力资源上的投入。马克思指出:“为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而这又得花费或多或少的商品等价物。”^{[5]200}要在对人才投入和产出之间关系的重构基础上,确立科学的人才标准和人才选拔机制,并配套安排资金投入,避免单纯按项目或以物的视角来考核投入经费的局限性。要在对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综合衡量的基础上,确立人才使用标准和工作考核指标,加强对相关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和检查。

(二)以民生事业建设拓展“投资于人”的领域和内容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民生建设应以人民整体和长远利益为最高优先选项,而不是以利润等市场化指标为标准。例如,在教育培训领域,就应当摒弃西方社会的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等错误做法,使教育培训与经济发展纳入统一的国家安排中,服务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恩格斯指出,“在私人生产者的社会里,培养熟练的劳动者的费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负担的,所以熟练的劳动力的较高的价格也首先归私人所有”^{[29]209-210}。从劳动力再生产角度看,尽管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生产服务于剩余价值生产的需要,但社会并不承担对人的投资。这种状况只有在资本主义灭亡以后才能彻底改变,“在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里,这种费用是由社会来负担的,所以复合劳动的成果,即所创造的比较大的价值也归社会所有”^{[29]210}。可见,按照投资于人的原则推进民生建设,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再生产中所需要的教育培训费用,表面看起来是社会财富的支出和社会消费行为,主要由社会承担,但它本质上能够通过劳动效率的提高等方式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从而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增进与扩大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从共同富裕的要求看,“投资于人”要进一步拓展民生事业建设覆盖的领域和范围。在民生问题上,要大力开展可持续的城市更新工程,使城市基本建设投资服务于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积极推动线网、管网、电网、水网等生活性服务业更新发展。要构建适当的差别对待机制,对特定人群进行定向识别和给予专项支持,如向特殊人群发放专项消费补贴、节假日补助并实施特殊费用减免等。为适应现代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要求,在传统的养老事业、幼儿护理等领域之外,要逐步增加青少年、成年就业者心理咨询和疏导等机构设置,增加政府主导的、公益性的社会心理建设投入。在传统的社区建设投入之外,要增加城市公共生活空间的建设投入。在图书馆、科技馆等传统科普教育领域之外,要扩大建设以科技体验、生活体验等为特征的新型科普机构。要依托于对数字经济、基建新领域的投资,加大新经济领域的人力开发力度,使新兴产业部门的人力投入成为数字资本更新的有力支撑。

(三)进一步扩大就业供给,积极促进高质量就业

加强投资于人促进经济增长,首要问题是解决就业难点,核心问题是实现高质量就业。为适应我国经济增长内在机制的重大变化,必须积极促进高质量就业。一是要进一步扩大就业供给。要以民生领域为重点,拓宽就业领域和渠道。积极发展由政府资助的社区服务、养老服务和育儿服务等公益型或半公益型公共事业服务,创造更多服务性事业就业岗位。积极规划都市生活圈和服务圈,以城镇更新为依托,发展具有地方特色、富有人文内涵的新型生活服务业。二是要积极发展文化娱乐事业,放开市场管制,活跃文化市场。物质消费和精神文化消费均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要扭转单纯通过物质消费扩大内需的观念。休闲和消费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要在促进休闲的基础上促进消费和扩大社会需求。立足培育和发展旅游、休闲和文化娱乐业等产业,促进灵活就业,促进就业市场的扩大和内需振兴。三是要在整体上压缩在岗人员工作时间,释放更多就业岗位。工作时间过长,不仅难以提升就业质量,而且与共享发展理念、提升人民幸福指数的要求相悖。目前,我国企业就业人员工作时间普遍过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年上半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达48.5小时,工作时间较长^[30]。可以考虑进一步缩短

法定工作日劳动时间,将现有每周五天、每天8小时调整为每周四天半、每天7.5小时。要适应人口结构变化,加快实施中小学“小班制”,增加教师岗位,减轻教师负担。鼓励企事业单位改进工作作息制度,适当延长带薪休假时间。同时,严格控制企业加班,进一步提高加班工资,倒逼企业增加工作岗位,鼓励企业增加雇佣员工数量。四是以就业公平为导向,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加大对服务业、民生事业的财政投入力度,加强对退伍军人转岗就业的统筹性安排与一次性资助,完善企事业单位接收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激励性制度,进一步强化失业救济和再就业培训的财政保障。

(四) 调整公共投资结构,增强人力投资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增强民生投入是促进投资于人的重要前提。从投资于人的推动力看,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在这方面,当前工作的重点是加快改善公共投资结构,扩大社会公共性消费支出。一方面,要根据经济发展情况,进一步发挥财政转移支付的作用,加大对教育、科研、人口生育、医疗卫生、健康等领域的投入力度,在促进均等化、均衡性的基础上提升资金投入的效能。财政投资进一步向乡村、偏远地区等欠发达地区与低收入群体倾斜,补齐区域人力发展短板。科技投入决定着一个国家人力投资所能达到的高度,是决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也是影响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在科技投入上,要加强对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和核心技术攻关,加大基础投入和专项投入的力度,形成科技投资的合力。在教育投入上,要在现有基础上稳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促进城乡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加强和完善对职业教育和专业培训的财政支持,构建终身学习支持体系,进一步增加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投入。另一方面,要扩大社会公共消费的支出。社会公共消费同样是对人的投资的组成部分。在实践中,“投资于人”既可以从个体或特定对象出发来落实,也可以从整体性安排来推进,社会公共消费支出主要服务于后者,且具有覆盖面广、正外部性强等特点,是投资于人的重点方向。要扩大社会公共消费的领域,拓展服务项目,以此来减少居民个人的消费支出,释放消费潜力,引导居民消费需求向更高层次的社会消费需求跃升。

(五) 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

收入水平和劳动者的权益状况,直接决定着劳动者个人的人力投资行为。要积极为“投资于人”创造有利条件,就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夯实消费需求持续扩大的微观基础。首先,要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在初次分配中,要积极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新发展格局下,要顺应劳动力再生产社会化规律,注重提升社会净工资水平,为劳动者及居民家庭提供稳定收入预期^[31]。其次,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要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完善个人所得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监管与调节。要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按照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战略部署,逐步探索开征财产税以缩小财富差距,开辟新的公共财力来源,增强社会公共服务和保障能力。要重点推进新业态和新组织税制改革,制定与零工经济、灵活就业相适应和挂钩的税目和税率的政策。再次,要优化创新创业环境,提升劳动者素质和技能,完善按要素贡献参与收入分配的制度,积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使消费结构升级具备现实的支撑。最后,要探索推行错峰上下班、弹性工作制等更加灵活的工时制度,满足劳动者多元化生活与消费节奏的需求。充分保障劳动者的各种权益,特别是休闲时间权益,不仅要切实保障劳动者休息、休假的合法权利,还要对企业超时加班、过度考核等行为加强监督与检查,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约束。与此同时,要进一步健全劳动争议仲裁维权体系,简化薪资纠纷、权益侵害的维权流程,降低劳动者维权成本,以公正司法保障收入分配公平。

(六) 改善社会福利支出结构,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政府的福利支出在“投资于人”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投资于人”必须进一步改革福利制度。必须承认,所有的福利制度改革本质上都暗含着福利的扩张。福利扩张带来的财政压力

和不同福利项目间平衡的困难,是改革中必然要面对的问题。但这些困难不是根本性的,只是政策性的。福利制度方面之所以存在压力,与经济发展水平、就业率、老龄化程度、政府与社会讨价还价能力等密切相关。从根本上说,福利项目和支出水平的增长依赖税收的增长和就业的稳定,从国民收入再分配角度看,它们主要依赖对资本收入和非资本收入的调整。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福利制度改革要建立在人民群众福利需求的不断增长之上。同时,我国不应因市场竞争加剧、资本经营压力增大,就采取收缩社会福利的政策取向。改革福利制度和增进福利政策效果,应当重视在福利供给中综合采取货币化模式与实物化模式相结合的方式。社会福利水平与生活成本直接相关,不同群体的福利差异常常以生活成本差异的形式凸显出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价格机制的作用,不同社会群体面对的生活用品成本、服务价格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差异使得单纯用货币化模式提供的福利项目不能发挥应有作用,货币化的福利支出所体现的福利水平也失去其参照的合理性。在区位因素影响下,住房、教育、医疗和交通等支出,直接影响到群众享受到的福利程度。只有从实物和具体服务角度入手,才能更好地提高福利供给水平。例如在住房保障上,不仅提供政策性住房,还可以鼓励企业和单位利用合法合规的方法为职工建设宿舍、提供奖励性住房等,推动职住平衡,化解交通压力和新市民的购房难题。在社区事业上,也可以鼓励企事业单位建设养老院、养老中心、幼儿园、托儿所等设施,解决养老问题和幼儿托管教育问题,等等。总之,进一步推动福利制度改革,为消费升级与劳动力再生产创造宽松的条件,是落实“投资于人”的重要途径和内容。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J].求是,2024(22):4-8.
- [2]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N].人民日报,2025-10-29(1).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Paul M. Romer.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5):1002-1037.
-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16.
- [8] 西奥多·舒尔茨. 对人进行投资[M]. 吴珠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7.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30.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505.
-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23.
-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2.
- [13] 习近平. 之江新语[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150.
- [14] 习近平经济文选:第1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
- [15] 本报评论部. 从“投资于人”到“丰富人才资源优势”[N]. 人民日报,2025-12-11(5).
- [16] 张峰. “投资于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 思想理论教育,2026(2):28-35.
- [17] 202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25-06-11)[2026-04-20].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2506/t20250611_1193760.html.
- [18] 社会事业向好发展 民生福祉不断增进——“十四五”以来社会民生统计报告[EB/OL]. (2025-09-28)[2026-04-20].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509/t20250928_1961404.html.
- [19]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六号)[EB/OL]. (2021-05-11)[2026-04-20].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03_1901086.html.
- [20] 夏金梅.《数字经济人才蓝皮书:中国数字经济人才发展报告(2025)》发布[EB/OL]. (2025-11-17)[2026-04-20]. <http://cq.people.com.cn/n2/2025/1117/c367889-41414268.html>.

- [21] 张林山, 公丕明.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协同逻辑、现实困境与未来取向[J]. 改革, 2025(12): 100-110.
- [22] 赖德胜. 投资于人的三重逻辑[J]. 教育经济评论, 2025(4): 3-9.
- [23] 汪文正. “十四五”时期, 财政收入“蛋糕”更大, 财政民生投入近 100 万亿元——国家财政实力持续增强[EB/OL]. (2025-09-13) [2026-04-20].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509/content_7040534.htm.
- [24] 求是网评论员. “投资于人”, 见物更见人[J]. 红旗文稿, 2025(18): 48.
- [25] 倪红福, 王晓星. 以“投资于人”推动高质量发展: 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J]. 改革, 2025(6): 42-55.
- [26] 盛磊, 应晓妮, 刘立峰. 统筹“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理论、经验和路径[J]. 宏观经济研究, 2025(7): 31-38, 72.
- [27] 都阳, 崔慧敏. “投资于人”: 关键问题与实现路径[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5(6): 31-43.
- [28] 习近平. 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188.
- [2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9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30] 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EB/OL]. (2025-06-16) [2026-04-20].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506/content_7028018.htm.
- [31] 赵峰, 隋雨宸. 新发展格局下的劳动力再生产社会化——基于“投资于人”视角的分析[J]. 当代经济研究, 2026(2): 30-44.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and Path Selection of “Investing in Human Capit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on Prosperity

HOU Weimin^{1,2}, SI Peiying²

(1. Institute of Marxism,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218, China)

Abstract: Investing in human capital constitutes the intrinsic driving forc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material productive forces, a necessary means for population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and a critical component of achieving the objectives of socialist production and fostering the free and full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nvesting in human capital” and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are intrinsically unified. “Investing in human capital” enhances production efficiency, thereby accelerating the growth of social wealth. It also expands consumption, stimulates investment to meet higher-level needs, and facilitates labor reproduction, thereby creating conditions for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To implement the concept of investing in human capital, we should focus on continuously satisfying the people’s aspirations for a better life. This involves formulating and refin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icators centered on “investing in human capital,” deepening reform of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and steadily improving the livelihood security system. In terms of investment pathways, we need to optimize the investment structure by increasing allocations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livelihoods, and public social consumption. Regarding reform measures, we must coordinate the expansion of domestic demand with the deepening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s, adjust the structure of public investment to ensure the st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of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consumption structures, and unlock the consumption potential of China’s super-large economy.

Keywords: common prosperity;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population quality; public consumption

(责任编辑: 邓龙奎)